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汚名的比較：殘障與性

The Case for Comparison: Stigma between Disability and Sexuality

doi:10.6752/JCS.201203_(13).0013

文化研究, (13), 2011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3), 2011

作者/Author : 海瀝愛(Heather Love)

頁數/Page : 282-29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11/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3_\(13\).0013](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3_(13).00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污名的比較：殘障與性

The Case for Comparison: Stigma between Disability and Sexuality

Heather Love
海澀愛

張永靖 翻譯
Jerry Yung-Ching Chang

本文是我最新的研究，聚焦關注社會污名的問題。一直以來，我批判地使用酷兒這個詞彙，一方面指出這個詞語的用處，一方面卻也提醒，對於對抗正典(anti-normative)的連線政治(politics of coalition)而言，酷兒一詞有其局限。在這篇論文中，我建議，如果酷兒作為一個詞彙已然失去實質用途，我們或許可以考慮用「污名」作為替代，或許能為連線結盟的工作提供更好的根基。污名這個詞有助於我們理解橫跨各式差異的社會排斥，並解釋其內在動態，我在文中將討論污名之於殘障與性的關連性。我將透過我對於加裔美籍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來著手處理這些問題。高夫曼在1963年出版的《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一書指出，我們有必要找出一套污名理論，這套理論能處理所有社會邊緣(social outsiders)的處境，用高夫曼的話來說，也就是所有帶著「受損身分」(spoiled identity)的個人。這些人身上帶著某個特徵，使他／她們有別於他人，因此時常受到「他人矮化，從完整平凡的普通人矮化成帶著污點、價值貶損的一個人」(Goffman 1963: 3)。在我的新書計畫「《污名》檔案庫」(The Stigma Archive)裡，我正在研究高夫曼寫《污名》一書時使用的原始材料（多半是文學類的）。這本書收集了五花八門的材料，由許多不同的文類組成，研究的主題囊括各種想像得到的社會污名：同性戀和殘障

在書中的重要性較為突出，種族和族裔則著墨較少，但高夫曼書中受到污名化的人物還包括了酗酒的人、前科犯、遊民、應召女郎、爵士音樂家、口吃的人、犯罪少年、詐騙集團，以及其他社會底層的人民，這些全都是20世紀中葉「偏差研究」裡常見的人物類型。高夫曼堅持，為了分析的目的，我們應該將這些人全都放在一起討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看清這些群體共同遭遇的污名化，以及其內在動態。

高夫曼的論點和晚近許多探討身分認同比較的批判書寫背道而馳。在探討性相(sexuality)和其他身分認同類別時，批評家指出「類比的局限」(limits of analogy)，也揭露「就跟種族一樣」(like race)這個論點隱藏的陷阱，他們因此傾向捨棄比較，而轉向地域的(the local)、特定的、身體體現的、和具體的。例如琳達·歐柯芙(Linda Alcoff)在《可見的身分認同》(Visible Identities)就曾寫道：「我相信討論身分認同這個話題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非常特定、脈絡化的分析。這樣的地域性和特定性是必要的，因為身分認同乃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文化之中，受到社會與脈絡互動條件所形構而成，因此身分認同的本質、效應，以及與此相關需探討的問題也多半是地域性的。」(Alcoff 2005: 9)

我承認跨越身分認同的比較和類比的確有其局限，但「《污名》檔案庫」的目標之一卻是為比較和抽象化作辯護。我當然認為進行比較時得小心翼翼，但我也同時認為，我們不可能將分析完全局限於地域的層次上，因為抽象化和比較是思考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我認為對於身分認同以及社會排斥經驗的比較分析有其重要性，將有助於建立跨越身分認同類別的連線政治，這也是驅使我進行高夫曼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這樣的連線結盟模式是1990年代初期酷兒政治浮現時的目標。運動分子和學者對於酷兒的理解，並不是一個指稱性身分認同的名謂，而是一個能夠集結不同社會邊緣的詞語。依據這個概念，酷兒這個詞彙帶著一種應許，它對話的對象包括了從事族裔研究、非裔美人研究、女性主義、批判種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跨性別研究，以及殘障研究的批評家，也許能夠——只是或許——使得不同的社會邊緣齊聚團結，一同對抗麥可·華納

(Michael Warner)所說的「正典化政權」(regimes of the normal)(Warner 1993: xiii)。

雖然酷兒這個詞在過去幾十年來帶來極大的積極貢獻，當初的願景並未真正實現，酷兒未能呈現各式社會邊緣的處境。但我認為我們得繼續緊握這項連結邊緣主體的願景。在嘗試建立連線結盟的過程中必然會有問題產生，有些問題無可避免，與發生在運動現場訴求上的衝突、溝通障礙、與參與運動的成員無法投入都有關。然而，學者們能幫得上的是藉由為連線結盟之計打下知識上的基礎，解決部分問題。我認為我對社會污名的比較研究，目的就在於嘗試為社會邊緣主體的連線政治提供新的地基。在我看來，只是大聲宣稱「我們需要連線結盟」或是「我們想要連線結盟」似乎已經不夠了。我們需要努力為社會傷害(social injury)的比較分析奠定跨領域跨學科的知識基礎。比較為我們帶來許多難題，但我覺得解決這些難題的唯一方式就是往前進，寬廣地檢視一直以來那些試圖跨越差異思考的嘗試，同時審視這些努力背後必然伴隨著風險。

接著我將概述我現在對高夫曼的研究，然後談論酷兒作為一種對抗正典的連線政治，歷史發展為何。最後我將論證，關於污名的普遍性理論對於振興酷兒研究有其重要性，我也會試著指出污名理論與殘障研究這個領域的關連。

但首先我想要簡短地談論殘障研究這個新興領域，並解釋該領域與此研究的相關之處。我認為殘障研究著力發展的兩項概念，與此研究計畫緊密相關。其一，殘障研究的運動人士和學者已經發展出論述，針對以醫學模式認知殘障的思維(the medical model of disability)提出批判。他們指出，這樣的觀點將殘障個人化(individualizing)，賦予醫師權威（殘障人士本身則不具任何權威），將重點置於醫學上的矯治，以此作為對公共使用權和污名等社會問題的回應方式。學者們則是提議從社會的角度認識殘障(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作為對醫學模式的回應。這樣的認知模式關注的並非個人的病態或是矯治，而是既成的環境、體制和法律所造成的失能(disabling)效應。其二，殘障研究這個領域援引19世紀正常化(normalization)和醫學化

(medicalization)的歷史，對於污名已能提出頗具活力的敘述。許多殘障研究領域之中的學者都曾論及，我們之所以能從概念上思考何為「一般人」（或是「正常人」），有賴於奇觀式的差異作為反例，而殘障長久以來一直被當成是偏離常軌的最佳例證。酷兒研究的學者和運動人士同樣也對醫學定義下的性相提出挑戰，而為了鞏固各種不同形式的抵抗，所援引的歷史也是相似的正常化軌跡。因為有著這些共享的歷史和共享的政治策略，酷兒和殘障在我對於污名的敘述裡，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

I

我選擇以《污名》作為基礎來書寫一本關於連線政治的書，就某種意義上而言是個詭異的決定。《污名》出版於1963年，早於新的社會運動興起之前，書中也並未提及差異的價值，或是我們後來所知的「認同政治」。就算在那個時代，《污名》一書的政治立場也異乎尋常地中立。雖然整本書致力處理權力、宰制、抵抗等問題，我們卻難以賦予這本書明確定位。評論者經常批判高夫曼未能處理社會結構的問題，或是未能就自身研究中詳細列述的污名運作方式採取政治立場。（就這一點我想提一個高夫曼1960年代早期在柏克萊教書的小趣聞。他當時正在教授偏差研究，後來出版成為《污名》。關於這門課有一則故事，現在已透過高夫曼的學生蓋瑞·馬克斯(Gary Marx)的轉述公諸於世。在那堂課最後一天，班上一名黑人學生說：「你說的都很對，高夫曼教授，但我們能做的是什麼？」高夫曼回答：「那不關我的事」，把書砰地一聲蓋上就走出教室）(Marx 2000: 67)。在這一點上高夫曼和同時代的豪沃·貝克(Howard Becker)有幾分相似。在1967年發表於《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s*)期刊中一篇探討社會偏差研究的文章裡，貝克提出一個膾炙人口的問題：「我們站在誰的那一邊？」(Becker 1967)貝克論及，研究偏差的學者往往傾向站在偏差者那一方反對體制。雖然在高夫曼的書寫中我們多次看到他力挺社會邊緣，高夫曼本人卻十分強調他中立的立場。他不但沒有說：「我們

站在受污名化的群體這邊」，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拒絕思考這個問題。儘管如此，即便《污名》沒有處理群體集結的可能性（而是探討個人為了應付喪失社會資格〔social disqualification〕而採取的策略），在許多就認同和排斥進行比較分析的文本中，這本書仍是必讀的一本。它為當代探討比較分析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範本，指出可能的展望與不足之處。

高夫曼的《污名》取材相當廣，除了20世紀早期與中葉社會學、心理學的研究，高夫曼還閱讀回憶錄、傳記、個案案例，以及描述背負污名經驗的小說和短篇故事。這些材料大多數來自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其中許多來自於大眾媒體。由於高夫曼賦予污名這個概念寬廣的定義，加上他所閱讀的材料相當龐雜，《污名》書中的註腳為從事種族、性相、殘障、階級、族裔、移民、法律和監獄研究的學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20世紀中葉資料庫。高夫曼致力於在不同形式的社會排斥裡找出共通性。經由閱讀各式各樣差異性極大的文本，高夫曼構思出一套解釋力相當強大的系統化概念，包括了矇混過關(*passing*)、掩飾、表演(*minstrelsy*)、污名象徵、社會資訊等等。

雖然長久以來高夫曼一直是社會學必讀的正典，近來卻廣受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的關注，特別是殘障研究、女性主義和酷兒研究的學者。對高夫曼感興趣的酷兒研究學者包括：賽菊蔻(Eve Kosofsky Sedgwick)、麥可·華納和傑夫·努諾卡沃(Jeff Nunokawa)等人最近都曾撰文討論高夫曼。《污名》是殘障研究的經典文本，經常列入課程大綱，並節選收錄於雷納德·戴維斯(Lennard Davis)主編的殘障研究奠基之作《殘障研究讀本》(*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雖然此書的最新版並未收錄。《污名》在最近兩本殘障研究的著作裡也扮演重要角色，分別是羅絲瑪莉·嘉蘭湯森(Rosemarie Garland-Thomson)的《瞪視：我們看的方式》(*Staring: How We Look*)和托賓·席伯斯(Tobin Siebers)的《殘障理論》(*Disability Theory*)。法律研究學者吉野賢治(Kenji Yoshino)在2006年出版的《掩飾：公民權的隱性攻擊》(*Covering: The Hidden Assault on Our Civil Rights*)一書，也引用《污名》書中一個重要的詞彙。吉野賢治在書裡探討性認同與種族認同，他認

為，公民權時代雖不致要求個人隱藏自我身分認同，卻施加壓力迫使特定族群低調，這是公民權時代新形態的不平等。

對於這些當代的研究領域而言，《污名》之所以那麼重要，原因之一是高夫曼早已預見當代左派批評許多核心關懷。高夫曼除了關切身分認同、排斥和羞恥，我們也能在他的著作裡發現略具雛型的操演(performativity)理論和對於主體非心理化(non-psychologizing)的觀點。他不只描述社會污名化的運作動態，更就受到污名化的群體使用何種策略予以應對進行敘述。儘管如此，就算高夫曼似乎早已思考過所有我們現在感興趣的問題，他的研究方法和我們所使用的取徑仍有著重要的差異，而我感興趣的是這些差異。問題不僅僅在於高夫曼所使用的語言過時老派（的確是），或是因為他在處理受污名化群體受審的材料時看來有些冷血（他看起來也真的是）。高夫曼的研究方法在許多重要的面向上和當代左派的學術研究扞格不入，而我在計畫裡關切的正是這些差異。

特別令我感興趣的便在於，高夫曼概括式地類比不同社會群體，並不在意不同身分認同類別或是不同形式的歷史經驗之間的差異。高夫曼從五花八門的文本資料庫裡挖掘社會學概念，原先的脈絡對他來說幾乎已不重要。不同形式的污名與污名經驗各自之間的差異退居次要，區隔小說文本再現與社會現實再現的分野也不再那麼明顯。高夫曼將焦點聚集在「情境」或是「場景」之上，那是他稱為帶有「互動秩序」的小型世界。他注意社會互動的動態和溝通過程中諸多稍縱即逝的面向，包括了肢體表達(gesture)、衣著、臉部表情、儀態和語調。人們普遍讚揚高夫曼觀察敏銳，能夠精準描述日常社會情境的動態。即便如此，他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仍有別於近來一些側重「特定」、「具體」、「地域性歷史」和「身體經驗」的研究（例如對身分認同「寫實主義式」的描述）。

高夫曼的方法十分著重綜合比較。在《污名》一書，他往往先概述一個抽象的概念，然後舉例說明，這些例子通常是社會他者的自述以及描繪社會他者的文本，各式各樣的材料都有。舉例來說，他在書中一處提出丑角化(minstrelization)和佯裝正常(deminstrelization)這

兩項概念，並描述受污名化的人們面臨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他們不應過分宣揚自身的差異，然而他們也不應過度低調，表現得與「正常人」無異。在描述了這個概念後，他在註釋裡舉了幾個例子：「關於猶太人的例子，參照沙特(Sartre)，出處同上，頁95-96；關於黑人，參照布洛雅德(Broyard)，出處同上；關於知識分子，參照西曼(M. Seeman)，出處同上；關於日本人，參照古德林斯(M. Grodzins)，〈製作不美國的美國人〉(Making Un-Americans)，《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60期，1955年，頁570-582」(111)。在這類註釋裡，高夫曼的言下之意似乎是，猶太人、非裔美人、知識分子和日本人同樣遭受污名化，處於困境之中的經驗沒有重要差別。這些不同社會污名經驗的再現被扁平化去除深度，經驗本身幾乎不重要了。《污名》書內收錄的社會邊緣敘事全都是對高夫曼有用的題材，他運用這些敘述構思出一套關於社會污名的普遍性理論。

在《污名》書末，高夫曼強而有力地為「比較」和「抽象化」提出辯護，他明白地陳述跨越差異形式的比較研究能使我們獲得什麼，同時指出這項方法可能的缺失。他寫道：

我已論及，遭受污名的個人在生命情境上有太多共通之處，我們大可將他們歸類為同一類人進行分析，從社會問題、種族／族裔關係、社會解體(social disorganization)、犯罪學、社會病理學、偏差行為等傳統領域裡進行萃取——萃取出這些領域的共同點。我們只要根據極少對於人性的假定就能統整這些共通性，接著我們便能重新檢視這些領域中真正獨特的部分，藉此將分析上的連貫性帶入這些並非純然是歷史的和偶然形成的整體。我們知道了種族關係、老化、心理健康這些領域的共同之處，就能進一步分析他們的差異。也許我們總是得選擇保留舊有獨立的研究領域，但至少我們會清楚知道，對於每個領域我們都應從數個不同的角度檢視，而那些將興趣局限於一個獨立領域的人，不可能發展出這些連貫的分析視角。(164-165)

雖然高夫曼使用社會科學的語言，談論保持一定距離的觀察者藉由閱讀他者資料庫所能萃取的「精華」，我卻認為，在高夫曼尋求「連貫分析視角」的呼籲裡，我們能夠聽見一種慾望，他渴求的不只是專業利益或是科學進步而已。當高夫曼內心掙扎地呼籲統合「舊有獨立的研究領域」（而這些領域各自宣稱代表著不同的聲音），我聽

見（或是想要聽見）一種試圖找尋「共同語言的夢想」。當然這個夢是不完美的，但我認為當我們試著找出這些身分認同「壞毀」的群體有何共通點，高夫曼的方法能給我們一個努力的方向。

II

在高夫曼的《污名》我們看見他極具野心地跨越差異的形式、跨越身分認同類別、跨越截然不同的歷史。如前所述，我認為跨越不同形式的差異十分重要，有其建設性，但連帶而來的風險就是抽象化，離實際的生活經驗越來越遠，而這些經驗是我們一開始之所以關注污名化的原因。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抽象化和遠離生活經驗這兩項風險就一直和「酷兒」這個詞彙分不開來。「酷兒」語意上的彈性是最令人興奮的特點之一，它有一種奇怪的能耐，幾乎和任何事情都沾得上邊，這也使得這個詞能被用於連線結盟，串連社會邊緣。然而酷兒的難以定位卻也為某些人帶來深刻的不安。自從酷兒這個詞被挪用以後，批評者就指出，**酷兒**在社會中缺乏明確的對應物，不但無法跨越身分認同類別，到後來反而成了「白種男同志」的代稱符碼。

當然，某些對於酷兒研究的歷史性敘述，讓我們看見酷兒如何與性／別身分認同脫鉤，因此比傳統的身分認同政治更為有效。這種向上抽離、遠離身分認同的故事非常吸引人，然而我們不應該對**酷兒**無遠弗屆的能量感到過於興奮。我們得先問問自己，隨著研究的對象增加，酷兒是否就真的提供了一種更為有效的政治。在許多時候，讓酷兒普遍化的本意是好的，目的是防止「酷兒」成為一個自我局限的名詞，只聚焦於單一的壓迫軸線上，因此忘記了性相與大的社會結構、社會過程的牽連。酷兒寬廣的視野卻也有其問題，不僅僅使我們失去了賦予酷兒意義的特定經驗和歷史座標，向許多不同群體負責的本意到後來看來也像是一種意欲將這些群體占為己有的慾望。批評家之所以會點出酷兒理論的帝國雄心不是沒有原因。畢竟，為何那麼多不同形式的社會邊緣性都必須以酷兒這個名稱統而稱之？依據**酷兒**原先的夢想，酷兒這個詞彙也許能成為一種沒有實質內涵、普同的概念，或

是開啓一個帶有無限可能的空間。過去20年來，酷兒作為一種邊緣連線結盟的願景並未實現，許多人指出，這個詞彙虛假的普同性是其失敗的主因。

凱西·科恩(Cathy J. Cohen)在1997年的〈娘砲、陽剛女同與社會福利大媽：酷兒政治的基進潛能？〉(Punks¹, Bulldaggers, and Welfare Queens: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Queer Politics?)一文針對酷兒政治的失敗之處提出尖銳的批判。她認為，「現今的酷兒政治反映出許多階級、性別和種族上的特權，也許已然失去原有的潛能，無法在政治上發揮功效，處理有色人種的需求或動員有色人種。某些酷兒理論家與運動人士呼籲我們摧毀穩固的身分認同類別——例如以較為流動的方式來理解性行為——但他們卻未提及，是何種階級特權讓這樣的流動性得以發生。酷兒理論呼籲我們抹除固定的性身分認同類別，但似乎忽略了事實上，某些傳統的社會身分認同與社群連結，也許對於個人的生存非常重要。」(Cohen 2005)科恩指出，「酷兒」掏空穩固身分認同類別的企圖背後，帶有一種虛假的普同性：酷兒理應徹底掏空身分認同這個概念，但實際的情形卻是侵蝕了某些特定形式的身分認同，卻持續伸張其他身分認同群體的利益。許多有色人種的酷兒學者和科恩有著相同的憂慮。他們認為，酷兒表面上看來無遠弗屆的擴張性，事實上是一種強占併吞的政治，在口頭上對其他身分認同的形構開空頭支票，卻無法對自身相對穩固、凝聚的核心研究方法與意識型態信條提出質疑。²

科恩在該文明白陳述了一項滿懷希望的願景，她期許我們優先

1 譯註：punk的中譯，經譯者向作者詢問後，確認「punk」在監獄俚語中就是「bottom」（零號）的同義字（如下段所述）。在中譯時，一時之間尚未想出更好的譯詞，暫且先翻譯成帶有「娘」的含意的中譯詞。

2 例如請參照Marlon B. Ross對於衣櫃作為一種典範的批判。他寫道：「藉由讓種族不在場、將種族放入括號，傅柯和賽菊蔻兩人皆能立起一套內在邏輯一致的衣櫃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以衣櫃作為現代身分認同的地基。……在多數（白種）的酷兒理論裡，種族和階級只是大牌演員飾演的小配角……，功用是凸顯出櫃的慾望如何定義現代的性身分認同，任務達成旋即消失。」(Ross 2005: 176)

考慮「個人與權力的關係，而非仰賴某種同質化的身分認同尋找政治同路人」(22)，藉此賦予酷兒這個詞彙新的生命。她想像的政治形式會以「娘砲、陽剛女同、社會福利大媽的非正典、邊緣位置作為基礎，進行帶來進步轉變的連線結盟工作。」科恩在文中召喚各式種族化的性污名（其中包括了監獄中的零號〔bottom〕、非裔美國T女同〔butch lesbians〕，還有遭受極度污名化、靠社會救濟過活、性生活放蕩不羈的未婚女性），她認為我們必須轉向較小的社會類別，以此賦予酷兒新的生命。藉由處理這些極為特定的族群——娘砲、陽剛女同、社會福利大媽——方能實現酷兒的應許，造就「一種邊緣主體變形的連線結盟」(47)。這樣寬廣的結盟必須立基於「不同社群特定的切身經驗」，才能跨越差異。

我和科恩一樣，還沒準備好放棄酷兒曾經應許帶來的連線政治願景。關於科恩所想像能成功運作的連線結盟方式，我深信我們需要把自己的身分認同擺上檯面，而不是拋諸腦後。但我們也必須發展出一些方法，以理解並談論這些身分認同、歷史以及經驗的共同之處。酷兒不能只是「什麼都是」。如果是那樣，那麼酷兒很可能就什麼都不是。我們需要注意身分認同的立足點，但也要持續嘗試跨越這些類別。在嘗試納入、比較的同時，我們需要注意伴隨而來的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s)。如果酷兒要達成連線結盟的任務，就要同時具備特定性，卻又能夠予以掙脫。但我不全然相信酷兒是我們當下能用來完成這項任務的詞彙。酷兒過往的失敗肯定會讓許多人喪失歸屬感。在此同時，我也認為酷兒可能既太特定又太籠統，一方面單純意指「同志」，一方面卻又什麼都是。

III

我對於酷兒連線政治的失敗感到難過，這讓我選擇污名這個詞彙作為現在研究的核心架構。我覺得，雖然酷兒的潛力可能已被用盡，對於社會傷害和社會排斥的比較分析仍然可能，而污名也許是執行這項任務時重要的詞彙。我認知到的優點有以下幾項。一、比起酷兒，

污名這個詞彙背負了較少有爭議的歷史和聯想。關於酷兒之所以失敗的論戰已經發生，人們也意識到酷兒是富裕白種男同志獨占的所有物，這些都可能使得酷兒難以用於連線結盟；二、污名並不僅僅和某一種身分認同類別有關。它和性相有某些關連，但兩者並非不可分離地綁在一起。這個詞語和殘障、性別、種族、宗教的關連性也很強；三、污名聚焦關注的是特定形式的邊緣化，是許多不同社會群體共同經歷的具體社會動態。運用污名這個概念，我們也許就能，依據高夫曼所說，以「極少對於人性的假定」為基礎締結寬廣的連線結盟。

對於研究性相和研究殘障的學者來說，社會污名這個概念有著一定的吸引力。我認為以社會邊緣、代罪羔羊(scapegoat)、偏差行為者的形象為基礎的差異模型與這兩個研究領域切身相關，兩者在知識上有著相同起源，其中包括了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傅柯率先提出一種權力的模型，他指出權力的運作乃是經由「正常化」，而非透過由上而下暴力的施展，也強調權力是一種效應，隨著「正常」與「病態」兩者分野的建立而產生。傅柯師承寫作《正常與病態》(*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一書的醫學史學家康居朗(Georges Canguilhem)，而傅柯對於權力醫學診斷式的分析模型也借用自康居朗。我們或許可以說，現代同性戀身分認同和20世紀建構的「殘障」兩者都起源自醫學，也在稍後經歷了類似的轉變。原先醫學上的診斷經由傅柯指出的「逆論述」(reverse discourse)過程轉化成為自我對於身分認同與社群的宣示，一方面帶來驕傲、正面(affirmative)的身分認同，另一方面到了20世紀末卻也有部分人士轉向擁抱怪胎、偏差者、怪物的邊緣位置，或是更明確來說，擁抱酷兒和殘廢(crip)。污名不僅對於理論化或是敘述同性戀、殘障兩者的歷史有其重要性，在兩種運動中，我們也可明顯看到一派擁抱污名、將污名視為核心的基進路線。

接著我想檢視一個例子。高夫曼《污名》書中的一處原始材料，曾就遭受污名化的他者連線結盟的可能提出思考，儘管是以負面的方式呈現。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有許多人和高夫曼相同，對於不同社會邊緣之間的關連深感興趣（無論是社會或是抽象層次上的關連）。《污名》的註釋裡包含了許多這個時期的個案案例彙整，有些

是虛構的，有些則是事實。這些集子包含了對於不同社會邊緣的觀察，或直接或間接對不同形式的挫敗和社會排斥進行比較分析。一個特別有趣的例子是《弱者：18個社會的受害者》(*Underdogs: Eighteen Victims of Society*)這本書，1961年在英國發行初版，一年後在美國以《弱者、苦悶與焦慮：18位男女自我書寫的案例》(*Underdogs, Anguish and Anxiety: Eighteen Men and Women Write Their Own Case Histories*)書名再版。1960年，《觀察家報》(*the Observer*)當時主要的文學評論家菲利普·湯恩比(Philip Toynbee)在英國各大報刊登徵稿啓事，徵求「弱者的告解」。在書中的引言，湯恩比描述自己前兩周就收到超過500則回應，最後他選擇了其中18則出版發表。

這本書非常自覺地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定義弱者？」這個問題問的不只是什麼樣的社會特質將某人標示為社會邊緣，更在質問，閱讀這些社會受害者的敘事時，什麼樣的態度或情感才是恰當的反應。該書收錄了許多不同處境人們的「告解」，其中有些人後來經由集結組織成為社會運動，有些則否；有些人的例子看來極為熟悉，是典型的社會邊緣，有些則較為難以分類，我們較難看出這些人為何稱得上是弱者。這些案例包括了對於貧窮、無家可歸、殘障、家暴、同性戀和私生子的描述，也有一位雞姦者、一位戰爭期間照顧四個年輕子女的媽媽、和一位文學夢受挫的捉刀代筆作家的自白。每位撰稿人都必須解釋他的故事為什麼值得關注，而他又為什麼該被認為是社會的受害者。但湯恩比指出，在許多例子裡，我們很難判斷一個人究竟是受害於社會不平等，或是因為普遍人類境遇的不幸而受苦。他寫道：「對於我們大多數人而言，殘酷的丈夫和毫無魅力的女人似乎是我們所知或我們所能預見，人類生存之中無法改變的面向。」(Toynbee 1962: 12)

因為自然發生的苦難和人為的苦難兩者間缺乏明確的區分，我們可能難以判斷哪些弱者的故事能夠作為社會群體的基礎。這些五花八門的社會邊緣、失敗者、輸家、同性戀和受虐婦女有可能組成一個有意義的社會群體嗎？我們無法清楚知道，但湯恩比在引言裡轉載的一封讀者投書似乎暗示那真的有可能。湯恩比在引言中引述一封讀者致

《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編輯的抗議信。這位讀者認為，湯恩比先生要求人們將自己看作弱者的舉動，對於英國人的男子氣概和國家的未來構成了威脅：

菲利普·湯恩比先生正呼籲讀者提筆，為「弱者自白」的討論撰稿。他說，撰稿人「所謂遭受不平對待或是屈居劣勢的情形可以是種族上、性方面、精神上、刑事上或是其他任何種類的」。

這本書應該成為 20 世紀的經典，是山謬爾·司邁爾斯(Samuel Smiles)維多利亞手冊《自助》(*Self Help*)的當代惡搞版，適合想要沉淪和尋找最新適應不良失敗案例的讀者，坐在公園裡的長凳閱讀。

在過去，對於罪犯和弱者的崇拜多半局限於知識分子和富有、放蕩不羈的藝術家。現在卻有令人憂心的跡象顯示，這項崇拜開始滲透至英國的一般大眾，在社會地位最為崇高的群體間也獲得認可。

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書籍和電影傳達並鼓勵這種品味。很快地所有的倫敦劇院無一倖免，演出的全都是關於小偷、皮條客、流氓、娼妓、性成癮者和階級成癮者(class-maniacs)的胡言亂語。

人們瘋狂地尋找新的弱勢品種，包含了受到誤解的勞動階級大學生和各式各樣的變態。這是一項嚴重的疾病，到最後人們會完全認同於盲目崇拜的偶像。我們的命運將是，成為我們所愛的。

然後英國的象徵性人物就會是一個愚笨、陽萎、沒有手臂、雜種(half-caste)的手，不斷抱怨他遭到獨臂的外國競爭對手不公平的對待。(Toynbee 1962: 10-11)

至少對於這封信的作者而言，崇拜弱者的意義不只是國家的向下沉淪，更對「正常人」應該有智力、是成功的異性戀、四肢健全、白種、沒有犯罪紀錄、態度良好的想法造成挑戰。這位作者想像中浮現的形象是由一堆雜七雜八非理想的部分構成，翻轉了希臘人的理想型樣(the Greek ideal)。透過戲謔地模仿湯恩比的弱者計畫，這位作者將數個不同的污名結合在一個身體。這樣的怪誕(grotesquerie)卻可能是創造社群必須的條件，至少在抽象的層次上而言。污名的概念徹底挑戰了身體的完整性，也徹底挑戰封閉性的身分認同類別，正是這樣的污名應許連結所有的輸家、失敗者、怪胎和社會邊緣。這些具有腐蝕性、連結性的潛能原先是由酷兒所召喚的，以作為一種廣泛對抗「正

典化政權」的抵抗形式。那麼我們也許能將這個醜惡的怪物視為一種指引，他身上帶著自毀的手冊，為我們指向未來的酷兒群體。

引用書目

- Alcoff, Linda. 2005. *Visible Identities: Race, Gender, and the Se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Howard S. 1967. "Whose Side Are We On?," in *Social Problems* 14 (1967): 239-247.
- Cohen, Cathy J. 2005. "Punks, Bulldaggers, and Welfare Queens: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Queer Politics?," reprinted in *Black Queer Studies: A Critical Anthology*, edited by E. Patrick Johnson and Mae G. Henders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rinted in *GLQ: Gay and Lesbian Quarterly* vol.3 no.4[1997]: 437-465.)
- Goffman, Erving.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Marx, Gary T. 2000. "Role Models And Role Distance: A Remembrance of Erving Goffman," reprinted in *Sage Masters of Modern Thought 4 Vols., Vol. I*, edited by Gary Alan Fine and Gregory W. H. Smith. London: Sage.(First printed in *Theory and Society* 13[1984]: 649-662.)
- Ross, Marlon B. 2005. "Beyond the Closet as Raceless Paradigm," in *Black Queer Studies: A Critical Anthology*, edited by E. Patrick Johnson and Mae G. Henderson, pp. 161-189.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oynbee, Philip. 1962. *Underdogs: Anguish and Anxiety*. New York: Horizon Press.
- Warner, Michael. 1993. "Introduction," in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Warner.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